

产业政策讨论中的两点不足

■ 吴敬琏

去年以来, 产业政策的是与非在政学两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意义十分重大, 但我感觉, 这些热烈的讨论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中国的产业政策取径于日本。从日本的经验看, 产业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的”、“选择性的”或“硬性的”产业政策, 一类是“横向的”、“功能性的”或“软性的”产业政策。两类不同的产业政策实施于不同的时期, 其政策效果也不同。

随着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迎来了历史性转变机遇。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比较》编辑室、中国比较经济学会近期邀请学者和相关企业家一起, 在北京基金小镇服务中心就“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有效”进行讨论。现将各位学者的发言整理成文, 在公号上发布, 供读者们参考。

去年以来, 产业政策的是与非在政学两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意义十分重大, 但我感觉, 这些热烈的讨论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不足之一是没有在过去几十年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做进一步的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产业政策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国际

上讨论的焦点并非要不要产业政策, 而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产业政策和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我们《比较》辑刊就发表过不少有关这一问题的名家论文, 例如《比较》第 81 辑发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的获奖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 他说的公共政策就是指产业政策。阿吉翁(Philippe Aghion)等人在《产业政策和竞争》(见《比较》2016 年第 1 辑总第 82 辑)一文中提出, 信息技术产业的特点是赢家通吃, 很容易形成一家或者几家的垄断地位,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设法让那些弱小企业留在这个领域, 以保持与大企业的竞争。这种主张显然与梯若尔提出的不一定要留在原来的技术领域而是用开辟新技术路线的方法颠覆原有路线的看法各有千秋。

然而, 在国内的两种讨论中, 主题变成了要不要产业政策的两种经济哲学的宣示: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发挥市场的功能就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 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 另外一种

观点则主张无边界地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两种观点都对学术界那么多人多年的研究成果置之不顾, 这是很可惜的。

不足之二。中国产业政策是 1987 年从日本引进的, 日本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反思他们早期的产业政策。但是在近来中国学者的争论中, 几乎没有人提到日本执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建议引进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1985 年, 中日学术交流会在冲绳开会时, 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洪主任提出, 中国流行的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评价过高。他自己组织了 20 位资深的日本经济学家编写了一本题为《日本的产业政策》的书, 批判性地总结了日本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这本书运用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基本意思是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 可以考虑运用产业政策来加以弥补。

但即使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也不等于

简单地用政府的产业政策去纠正。因为政府调节本身的成本很高, 有副作用, 即政府失灵。所以, 问题在于, 怎么解决好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怎么把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 使得产业政策起到提升市场功能的作用。至于日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选择性产业政策, 其消极面大于积极面。

《日本的产业政策》这本书还指出, 日本很有竞争力的产业绝大部分不是通产省主导的产业扶持下产生的。马洪主任听到这个意见之后, 把这本书交给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翻译成中文并于 1988 年出版。不过, 这本书的中文版只印了一版就没有了。鼓吹通产省选择性产业政策作用的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书《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直到 90 年代还在不断再版。

为弥补这些缺陷,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在去年围绕着“产业政策”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

发表在《比较》2016 年第 6 辑(总第 87 辑)上, 在这辑《比较》上除了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的论文之外, 还有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原校长八田达夫教授的文章。参加 CIDEG 会议的还有曾在通产省工作了 20 年的日本学者津上俊哉。他在会上讲到, 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 也就是所谓的选择性产业政策, 在日本“早已进入博物馆”。但是, 现在好像又有人把这种政策提出来了。实际上, 日本通产省后来也否定了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不过, 这种政策的影响仍然还在。竞争力问题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2000 年的书《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用翔实材料分析了日本经济缺乏竞争力的一面, 里面就谈到了日本为什么没有竞争力, 这里面就分析了日本早期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

1987 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报告, 建议中国引进一套协调价格、金融、财政、税收、外贸、外汇等调控手段的综合政策体系, 选择对某种或者某几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加以扶持, 同时对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进行抑制。具体来说, 当时要限制加工工业的发展, 推动基础产业也就是重化工业超前发展。经过中央领导的批示, 成了国家政策, 而且明确了产业政策在政府经济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另外, 这种政策下的企业政策的特点是扶持一些大集团, 另外发展一批小企业“众星拱月”。通产省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受到许多批评, 有些被议会否决, 也有被法院判为违法。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 可谓日本产业政策的后遗症, 即日本政府主导建设筑波科学园区的故事。1963 年, 日本政府决定把日本政府所属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都搬到筑波, 用 10 年时间建成所谓“日本的硅谷”——筑波科学城。但是, 由于政府主导的方式缺乏效率, 虽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 最后还是没有如愿发展起来。我们一定要吸收类似的教训, 否则容易造成很大的浪费。

现在, 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日本数十年来产业政策研究取得的成果, 完善我国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要有利于提升市场的功能, 强化竞争而不是抑制竞争, “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样, 在“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中, 也要主要靠发挥市场激励创新和优胜劣汰的作用, 使政策更加有效。

破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认识误区

■ 王晶雄

今年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 对于我们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 有些人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认识上存在种种误区和疑虑, 对此必须予以澄清。

误区之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理论, 并不新鲜

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世纪 70 年代, 当时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滞胀”局面, 供给学派强调通过增加供给创造需求, 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正在我国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虽然也强调从生产、供给入手调整经济结构, 但两者的背景存在明显差异。当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 但是并没有出现“滞胀”,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近两年我国 GDP 仍然保持了 6.5% 左右的增速, 所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理论的翻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 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实际上,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下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 现实的人具有多种感性需要, 而单个的人能力有限, 无法生产多种商品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 于是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 所以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认为, 生产、分工、需要、交换紧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 忽略人的需要导致蒲鲁东很难正确把握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蒲鲁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 那就是他干脆忘记了需求, 忘记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的需求的条件下, 才说得或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谈, 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

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这里的“需求”实际上就是指人的需要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表现。针对蒲鲁东认为“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 即所谓“物以稀为贵”, 马克思认为: “假定某种产品不仅极为稀少, 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如果对它没有需求, 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太多, 也是多余的。相反地, 假定某种产品有千百万个, 可是如果它还不能满足需求, 也就是说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大, 那末这种产品仍然是稀少的。”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提示我们, 生产、分工、需要、交换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彼此互相制约, 不可分割。任何商品的“多”和“少”、“价格”的“高”和“低”都是一个相对概念, 它们都相对于人的需求而言, 一旦离开需求, 这些概念都是抽象的。因此,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供给和需求制约着生产和消费, 而需求又制约着供给。所以,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消费制约着生产, 需求引领供给,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在我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后的今天, 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阶段演进的过程中, “需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将不断提升, 因此, 适时、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误区之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导致一大批企业关停并转, 将会使中国经济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从生产端入手, 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 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降低企业成本,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 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有些人片面解读这段论述, 只强调“三去”, 而没有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包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业和现代服务业, 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从而错误认为我国经济将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性”3 个字十分重要, 这是因为这 3 个字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 “结构”与“功能”紧密相连, 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事物的存在状况, 当量变超过一定的度则会引起事物的质变。从这个角度来看, 有些人的担忧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我们还要看到: 一方面, 在我国经济出现新常态的背景下, GDP 仍然保持 6.5% 左右的增速, 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仍然是一个不低的发展速度, 而在调结构的过程中, 我们压减的主要是一些产能过剩的产业, 这些变化完全在“度”的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 事物构成要素在空间关系即排列次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 也会直接影响到事物的性质和功能。这种“结构影响整体功能”的辩证思想实际上在我国古代已有萌芽, 人们耳熟能详的田忌赛马的故事,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相反, 还能大大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误区之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抹煞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之间的差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 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 从

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环境需要, 既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两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因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抹煞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之间的差别。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差别, 弗洛姆曾经作了精辟的阐述, 他认为, 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主义是一个为人的需要服务的社会。但是, 很多人会问: 难道现代资本主义不正是那样的吗?”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认识和实现人的真正的需要, 而只有当生产为人服务, 资本家不再创造和利用人的虚假的需要时, 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真正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社会, 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满足少数人资本增值需要的社会。为了资本的增值, 资本所有者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扩大再生产, 而劳动者仅仅成为消费商品的工具、资本增值的工具, 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物化的社会, 是一个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的社会, 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资本的增值。与此相反, 社会主义社会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是一个“人是目的”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 才能真正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所以, 当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具有质的差别, 两者不能混淆。

误区之四: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使我国全面进入消费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为了说明当前我国老百姓需求升级的新情况, 曾经说过: “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 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 购买的商品已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化妆品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有些人不顾具体语境对这段论述作了片面理解, 认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消费者将成为真正的“上帝”, 想要什么企业将生产什么,

从而使我国全面进入消费社会。

应该看到,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 消费主义业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资本的增值, 商家不断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要, 甚至煞费苦心创造需要, 而消费者在消费中感受自己的存在感, 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 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这方面的教训需要我们汲取。但是, 人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可以分为“奢侈的需要”和“必要的需要”, “奢侈的需要”即“虚假的需要”, 而“必要的需要”即“真实的需要”。

何谓真实的需要、何谓虚假的需要? 弗洛姆认为: “人的真正的需要是指那些对于实现人的本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马尔库塞作了更为形象的描述, 他认为在外界引诱下而产生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 这些需要与实现人的本质毫无关系, 反之即为真实的需要、合理的需要。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思考值得我们借鉴, 这就是人的真正的需要与实现人的生命本质密切相关。唯物史观认为, 人的生命本质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自由意识的活动, 是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 凡是对于实现人的生命本质密不可分需要都是人的真正需要; 反之, 则是虚假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 那些与人的本能欲望相连接的过度需要显然是一种虚假需要, 这些需要与实现人的生命本质风马牛不相及。

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合理需要, 而不是一味迎合有些人的虚假需要, 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本质, 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我国经济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必须排除干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 破除各种认识误区, 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